

CIA
KGB



秘密战

〔美〕桑契·德·格拉蒙特著

贝 金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秘 密 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
美苏间谍斗争

(美) 桑契·德·格拉蒙特著

貝 金 譯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秘 密 战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625 印张 361 千字

1964 年 6 月第 1 版 198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000,001—130,000 册 定价：1.60 元

重 印 说 明

《秘密战》是1962年美国纽约普特南之子公司出版的。作者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他以自己的观点介绍了美、英、德、苏等国间谍特务机关的组织、首脑人物和活动情况，并用很大篇幅叙述了他们之间的隐蔽斗争。此书可供有关单位和研究人员参考，对广大读者也有阅读价值。

目 录

全面的間諜活动.....	1
回 顧.....	29
朱迪·柯普朗——談情說爱的特务.....	50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暗斗.....	82
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伙伴.....	120
美国和俄国的“魔术”.....	131
魯道夫·阿貝尔——一位画家的真面目.....	152
被斬掉双翼的 U-2 型飞机	183
流年不利的英国.....	223
我喜欢的是敌人叛变,但不喜欢叛徒	284
逃出自由世界的人.....	323
外交人員、軍人和間諜活动	350
德国——颶風的中心.....	402
間諜工作的未来.....	440
結束語.....	454
附 录.....	458

全面的間諜活動

1955年，美国“情报差距”所引起的焦虑曾促使胡佛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小组对中央情报局进行了调查。这个专门小组建议，“在制定政策时，应更加大胆”。小组曾就美国的情报工作同苏联的情报工作做了一番对比，认为苏联“相形之下，比较容易地搜集到我国的重要机密”，而美国在这方面则盲目摸索。小组建议，应更“乐于承担某种预见到的政治和外交风险，并充分利用技术人才”。

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在提出建議后的六年中，这些建議都已付諸实施，而且大大超出了該专门小组的期望。在对古巴采取了冒险行动和U-2型飞机越境飞行事件发生以后，誰也不能再指責中央情报局胆小怕事了。这些日子，把中央情报局說成是一个輕举妄动的怪物，倒成了一时的風气了。弗萊德·庫克曾在1961年6月24日《民族》周刊上写了一篇“揭露”中央情报局的文章，他总结說：

总统談的是和平，但中央情报局却在推翻政权，策划内部破坏活动和革命，对友好国家暗派鴉片种植者，指使軍事侵略行动，支持右翼軍国主义者。这一切都不是一个自称为具有崇高理想、热爱和平的民主国家所应采取的行动。这一切都是披上右翼外衣的共产国际的行徑。

庫克表達了許多人的那種震驚心情，這種心情是人們在获悉美國雖把外交政策建築在維護和平的基礎上但暗中又在煽動戰爭時，必然會產生的。

然而，同樣出乎意料的是，局面的徹底扭轉只花了六年時間。在1955年，問題是如何使中央情報局放手去干，因為這個機構沒有提供足夠的情報，特別是有關鐵幕後面的情報。而在1961年，問題卻變成如何去限制中央情報局的活動，防止它再招致另一次古巴慘敗，使美國摔大跤。如果我們記得中央情報局在情報工作領域中不過是一個新建機構，那麼，對於美國情報部門的力量和它的大膽行徑就會感到更加驚訝了。中央情報局建於1947年，但是到了1950年才真正開始工作，艾倫·杜勒斯就是在這一年加入這個機構的。

在這短短的時期內，中央情報局已經成長起來了，就像一個嬌弱的孩子在青春時期就成了地方上的一霸一樣；意味深長的是，這個時期也正是進行冷戰的時期。

與此同時，蘇聯的情報工作也不是停滯不前的，杜勒斯本人有一次就曾說道：“我參加中央情報局以來，曾經審閱過許多有關共產黨陰謀的確鑿證據。”蘇聯間諜在美國進行活動已經有四十多年，而蘇聯遍布世界的間諜機構也都為進行冷戰全力以赴。

古巴和U-2型飛機事件，已經使輿論隱隱約約地認識到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為了對抗蘇聯，美國就像蘇聯一樣，正從事全面的間諜活動。固然，在製造導彈方面，美國正在同（或力圖同）蘇聯一比高低，就是在秘密的情報戰方面，美國也正在同蘇聯爭一日之長短。蘇聯情報部門所使用的手法，美國情報部門差不多也都能運用自如。兩大集團的情報部門，都組織嚴密，力量強大，而且也都在秘密和冷酷的氣氛中進行工作。

蘇聯和美國的情報機構都在相互指控，都把對方說成是最大的組織。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前主席А·И·謝列平（當時是艾

倫·杜勒斯的對手)早在1959年就在《真理報》上寫道:“資本主義各國的間諜機構,特別是美國的間諜機構,都在不斷擴大。例如,僅就中央情報局這一機構而言,它現在就僱用了兩萬多人,每年動用十五億以上的美元。同戰後的頭幾年相比,美國反間諜工作的規模在近几年已增加為原來的十二倍。”杜勒斯在對記者所發表的僅有的一次公開談話(載於1954年3月19日出版的《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中說道:“在這方面(間諜網的數目),蘇聯情報部門當然是領先的。他們在世界各重要國家吸收和使用特工人員,同時還通過他們的‘外圍組織’,控制更多的人員。”在另一篇演說中,杜勒斯又說,

為進行間諜和秘密政治活動,蘇聯擁有的訓練有素的特工人員為數之多超過任何國家歷來所掌握的人數。在莫斯科、布拉格、北平以及其他共產主義中心,他們正在訓練從許多其他國家招募來的特工人員,然後把他們當作共產主義的使者派往世界的多事地區。中東和東南亞的大部分地區以及黑非洲,都高高地列在他們的目標單上。他們也沒有忽視我們這個半球,最近所揭露的共產黨在墨西哥的陰謀就向我們證明了這一點。

在針對間諜部門的罪惡所提出的指控中,我們也可以聽到雙方類似的論調。蘇聯新聞局的小冊子《當場捕獲》(這是1960年發表的指責中央情報局的一本小冊子,一位美國情報官員給了我一本,他評論說:“這不是《聖經》,但它的確有一些很不錯的材料。”)就這樣說:“美國所進行的間諜和顛復活動確已成為全面和全球性的了。這種活動包括偷聽電話、翻譯外國政府的密碼電訊以至於派遣特務和間諜飛機、策劃各種陰謀和武裝政變,公然粗暴地破壞他國的主權。”

而众議院的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所編写的小册子《共产党間諜活动的方式》中則有这样一段話：

共产党国家的大使館、領事館、駐联合国的代表团、貿易和其他使团，过去和現在都被当作合法的掩护，用来掩盖国际共产党間諜网……共产党国家的外交、貿易以及同类性质的使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久經訓練的内务部和軍事情报机关的行动人員組成的……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官……采用訛詐、恐怖和其他不可饒恕的手段……也可以找到某种证据证明苏联正在利用国与国之間的交換計劃来支持其間諜活动。

J·艾德加·胡佛在1960年的撥款申請中，就曾对众議院撥款小組委员会說过：“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从来就沒有間断过……我們的調查已經清楚地表明，苏联集团为反对美国而进行的情报活动已有了全面的擴張。”胡佛的联邦調查局就負責遏止苏联针对美国所进行的間諜活动。

苏联在美国的間諜活动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第一个有組織的間諜机构就是在苏联駐美貿易处的掩护下建立的，这一貿易机构于1924年在紐約成立了办公处。在对付共产党間諜方面，联邦調查局已积有将近四十年的經驗。而美国情报机构对苏联的渗透，則是一項新近才发展起来的工作。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1954年背叛的苏联内务部特工人員——就曾經根据自己的經驗发表这样的值得注意的声明：“作为一个职业的国家保安官員，我工作了二十一年，在这二十一年中，我始終沒有碰到一件外国間諜在和平时期在苏联进行活动的真正案件。在沒有提供絲毫证据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被指控进行間諜活动，并被枪决……在苏联，我始終就沒有听到过一个案件可以同发生在美国

的富克斯和納恩·梅案件、格林格拉斯案件或戈洛斯案件、发生在瑞典的安德逊和恩荷姆案件、或发生在日本的理查德·索奇案件相比。然而，根据苏联当局不断提出的警告，似乎苏联从上到下都布满了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务，因而只有永久地、冷静地保持警惕才能使苏联免遭毁灭。”

美国正以不亚于苏联的精力和决心进行一场情报战，这一事实的被揭露，不仅粉碎了人们为“道义”进行冷战的错觉，同时也粉碎了人们对“无神论共产主义”进行十字军讨伐的错觉。当公众得知放冷箭这种做法并不是苏联专用的战术时，有一部分人就对中央情报局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央情报局使用诡诈和“卑鄙手法”的种种事实已使它同苏联的间谍机构难分黑白。然而，在错觉破灭的时候，在自由社会里怎样建立有效的情报组织的各种问题也就出现了。

美国在冷战中的政策一向是承认社会开放的种种危险，并力图在国家安全、基本自由、对外政策以及情报活动等方面保持平衡。这种政策有时候使我们的总统陷于窘迫的境地。我们最近两届总统都曾经公开地为间谍活动开脱，而在历史上我们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的元首采取过这种做法。在U-2型飞机被击落以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曾承认，他亲自批准了利用一切可能手段获取情报的政策；而肯尼迪总统也曾两度由于古巴事件弄得窘迫不堪。1961年4月13日，也就是入侵古巴的前五天，他不得不口是心非地保证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决不插手干涉以促成卡斯特罗的垮台，他将尽一切可能“保证美国人决不卷入古巴周围的反卡斯特罗行动”，同时他“反对”从我国“发动一次攻势”去反对卡斯特罗。总统并没有说谎，因为4月18日在吉隆滩登陆的叛乱武装中并没有美国人。而且这次攻势也不是从美国发动的，而是从尼加拉瓜沿岸的岛屿上发动的，这些岛屿于1916年为美国所租借，为期九十九年。然而，肯尼迪先生当时的态度就好像

一位以每小时八十哩的速度駕駛汽車的人的态度一样，当这位駕駛汽車的人遭到警察的阻拦时，他竟若无其事地回答說：“噢，警官，我总共还没有开上一个小时呢！”

中央情报局是这次冒險行动的主角这一事实被揭露以后，我們年輕的总统便把責任攬在身上，就像他的前任在U-2型飞机事件中把責任攬起来一样。但是从此以后他对社会开放的信念大为动摇，竟至向报纸发行人建議实行新聞自动檢查制的办法。

4月27日，也就是对古巴事件感到犹有余痛的时候，肯尼迪先生向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說了这样一段話：

事实真相是，我国的敌人就会公然夸口，說他們通过我們的报纸就能取得那些必須雇用特工人員进行盜窃、賄賂或欺騙等手法才能取得的情报；事实真相是，我国为抵抗敌人的活动而暗中进行的各項准备，都一一为每个报纸讀者所了解。事实真相是，我們的部队和武器的規模、实力、地点和性质，我們使用部队和武器的計划和战略，都在报纸上极其精确地披露出来，以致任何外国都感到滿意。事实真相是，至少有一次，由于公布了我們所掌握的秘密机械的細節，使我們不得不付出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去改变这种机械。

目前，在看到一篇报导的时候，每一家报纸都会問自己：“这是新聞嗎？”我現在的建議，請你們一定要加上这样一个問句：这对国家有利嗎？

有一位情报官員对作者說，1961年1月9日发表在《紐約时报》上的一篇报导特別使肯尼迪总统感到煩惱，这篇报导以人們不願看到的危地馬拉的雷塔卢勒奥这个地名作为标题。《紐約时报》的通訊記者保罗·P·肯尼迪（与肯尼迪总统沒有亲戚关系）傳

出了关于中央情报局为即将发动的攻势训练古巴叛乱武装的消息。他說：在离太平洋数哩的科迪勒拉山的軍营和小型隐蔽飞机場上，“大部分来自美国的外国人員，正在訓練突击队使它們掌握游击战术。”他又說，他們进行訓練的目的是为了“使古巴爆发一場危地馬拉人认为无法避免的冲突”。像这类的新聞，总统显然认为是不宜发表的。

苏联人曾力图揭露一个“开放的”社会所摆出的問題。根据《當場捕获》这本小册子，“美国政客們为美国情报活动辯护而提出的”理論，“只是拙劣的宣傳把戏，它不值一駁。大家都知道，各国政府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国家机密。美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如果考虑到有关方面目前针对中央情报局所发出的叫嚷，考虑到作为古巴惨败的余波而出現的人事和組織变动，其中包括該局首脑艾倫·杜勒斯的更換，那么我們就会看到，苏联在这里提出的論点是軟弱无力的。正是因为我們的社會是开放的，西方的情报和反情报工作便有两类永远不易解决的問題：

1. 西方情报易于获取，苏联集团情报难于获取。在間諜活动中以打击納粹党人而名噪一时的艾倫·杜勒斯，就曾說过：“同我們目前所不得不面临的情况相比，德国是微不足道的。”杜勒斯先生还曾指出：“对俄国人來說，事情就好办得多了。西方的情报都是明摆着的，你只要弯下身来拣就行了。”

苏联的背叛者曾估計过，駐节美国的一位苏联武官，只要开口去索取，就可以取得他所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五的材料。只要付出一笔微不足道的代价，美国政府印刷局就会送上这样的文件：美国港口設備、飞机場的大小和地点、美国矿藏一覽表、退伍軍官名册。总而言之，实际上他們会送上任何东西，从“如何擰螺絲釘”一直到“如何制造原子彈”。美国內政部地质勘探局的地图資料处，也是一个很好的資料来源，它提供全美的地形图。訂閱

《航空周刊》和《原子科学家公报》之类的专门杂志的机会，他们绝不肯放过。苏联的外交官也参加工业大会。1959年在洛杉磯召开的西部电业会议上，两位俄国外交官就搜集了大量文献，多得无法带走，不得不雇用一辆客货两用汽车。据估计他们带走了重达两百五十磅的文件。像《驾驶员手册》或陆军工兵所出版的装订成十八卷的港口设备之类的出版物，在苏联肯定是会遭到禁止的，而在美国，则人人都可得而有之。

1960年4月，海军中将海曼·G·里科佛对国会原子能两院联合小组委员会说，一位玩具制造商生产了一种北极星式原子潜艇的模型，这个模型极其精确，以致“一位高明的舰艇设计师只要在那个模型上花上一小时的工夫，就可以对人说他毫不费劲地就取得了价值千百万美元的情报。”

贴在那个仅值两元九角八分美元的玩具上的说明这样写道：

弹道导弹核潜艇是另一组严格按照美国海军正式蓝图的规格制造出来的模型。通用动力公司电船部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了整套的精确资料，谨借此机会向该部致以衷心的谢意。没有该部的合作，制造绝对精确的模型是不可能的。这具模型具备这类潜艇的全部内部设备，包括原子反应堆、控制室、水手间以及两枚北极星式导弹。这具模型在每一点上都与实物无异，比例尺是1：300。

里科佛海军中将说，他感到“惊讶不已”，这种模型居然会拿到市场上来出卖，因为“如果我是俄国人，我会非常感激美国这种慷慨的做法，我以两元九角八分美元的代价就取得了这种情报。”这位以“原子潜艇之父”著称的海军中将说，这具模型在装置反应堆的仓面大小方面以及在操纵这类潜艇的水手人数方面，都提供

了精确的数据。然而，有人就里科佛海軍中將所提出的抗議，征詢一位歐洲科學家的意見時，這位科學家則說：“縱使俄國人能夠取得原子潛艇的藍圖，這批藍圖也是不值一偷的，因為藍圖太多，需要一座高達三層的建築物才裝得了。而且，在你取得這批藍圖之後，為了更快和更節約地製造自己的潛艇，你得費很大的事才能把各種規格改成米突制。”

這位歐洲科學家，最近從蘇聯旅行歸來，他宣稱，俄國人發表的科學情報比美國更多。他說，關於原子基地和導彈的發展情況可以自由取得，蘇聯人甚至还發行了一本小冊子，書名大概是：《美國的先鋒式導彈，它為什麼失靈，如何才能把它發射出去》。

然而，其他科學家卻注意到，蘇聯人對於他們的原子工廠却遮蓋得非常嚴密。他們用假名來掩蓋原子能機構。比方說，相當於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蘇聯機構，就用了“中型機器製造部”的名稱。

但是，蘇聯的科學家卻到美國來參觀美國的原子能設備。最近就有一批蘇聯科學家，在主管原子能利用的中央管理局的首腦V·S·叶美里揚諾夫的率領下，用了二十一天的時間周覽了美國的原子能設備。里科佛海軍中將就親自領導他們參觀了匹茲堡附近的希賓波特原子能動力站。隨後他們又訪問了賓夕法尼亞州伊利附近的恩里科·費米動力站，緊接著又參觀了阿貢尼國家試驗所，在這裡蘇聯人观看了反應堆，研究了製造鈾燃料原素的程序。叶美里揚諾夫先生怀着敬畏的心情注意到“工作是通过帶着手套操縱的汽門進行的”。這批蘇聯人又參觀了洛杉磯—阿拉謀斯地區伯克利的奧克立治原子城，向他們介紹了注射原形質，然後把原形質保存在一個磁性槽里的新方法的詳細情況。在參觀過程中，有一位蘇聯科學家高興地說：“我們把原子反應堆放在長方形的建築物里而你們則用圓形的建築物，其餘一切都是相同的。”美

国的科学家只能相信这位苏联科学家的話，因为美国科学家始終就沒有得到全面参观苏联設備的机会。

彼得·阿克塞尔是伊利諾大学的物理教授，1959年，政府請他筹划苏美科学家的互換工作。这次經歷使他感到非常为难。他說，苏联人並沒有为苏美互換科学家这件事作出什么規定，而且“尽管我作了一番努力，也无法得知在苏联究竟由誰来发出互換的邀請。”而在美国这一边，他发现：“根据苏联的过去做法，令人怀疑苏联人是否企图在某些技术和科学領域中破坏互惠主义。”

爱德华·特勒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物理学家，在发展氢彈方面起过主要作用，他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說，社会开放和在科学成就中缺乏保密制度的現象，有待我們討論的地方很多。他指出，“在美国，人們不願意在秘密中进行工作。保密制往往使某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士避开那种为我們的国防所极其需要的工作。我們大多数人，都願意在鼓励自由交換思想并能使自己为同事們所了解的場合中工作。”

特勒又說：“保密制是有傳染性的。这种制度能使朋友之間产生隔閡，使陌生的人彼此猜疑。同时它也使公众对于国家和国际大事的必要討論变得含混而不明确。而开放社会的做法，則肯定会帮助自由世界在組織世界的偉大任务中取得主动地位。”另一方面，他又說：“在俄国，保密則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就連核研究以外的科学家也受到限制，也被納入保密範圍。”

因此，在防止敌人获取情报这一問題上，我們出現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基本的安全制度是必要的；另一种是相信在自由社会中保密制度根本沒有好处。我們抱怨說，俄国人从公开的材料中找到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如果我們檢查一下这些公开的材料，恐怕抱怨之声会更大。

2. 我們的問題是：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情报和反情报的机构怎样才站得住脚，怎样才能發揮作用？与此問題有关的是联邦

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前者負責反情報和國內安全工作，后者負責國外情報工作。

J·艾德加·胡佛長期以來就是國會各委員會以及監督其所屬機構的其他政府部門的寵兒。1955年，胡佛委員會就情報工作所提出的報告說：“我們認為，聯邦調查局局長由於具有魄力、創始精神和管理能力，已把該局發展成這類機構的典型。我們深信，聯邦調查局是我們最有效的反情報機構。”

儘管他顯然具有堅定不移的信念，然而長期以來，他一直在大聲地抱怨說，在間諜案件中，“過了時的”美國法定程序使他受到束縛。聯邦調查局四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是：

甲、舉行公開審訊的規定。這一規定使得政府不願提起公訴，因為公開審訊就會把機密情報寫在記錄上。而在英國，舉例來說，蘇聯特工喬治·布萊克那個不便公開的案子，就是於1961年秘密審訊的。在美國，解決的辦法是使被告相信，服罪對他有好處。由於無需公開進行審訊，就可以換來較短的刑期。就這樣，在1957年，傑克·索伯在承認了犯間諜罪行之後，只判了七年有期徒刑。而在1961年，他的兄弟羅勃特·索本博士——一個遠不及其兄弟重要的間諜——在不承認犯同樣的罪行以後，却判處了終身監禁。

乙、限制性的法令往往阻止提出公訴。這種局面已經由於制定了所謂盧森堡法而改變了，這項法令排斥了影響國家安全案件中的限制性法令。

丙、現行法令不適用於在冷戰中所犯的罪行。現行法令是針對戰時的間諜活動和破壞行為制定的。其結果是，檢察官只有退而根據惩治犯罪陰謀的法令提起公訴，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有足夠的證據，證實犯罪的陰謀存在就可以了，而無需指出已經犯了罪。在美國，冷戰中的絕大多數間諜案件，都是預謀犯罪的案件。

丁、外交豁免權是偵察和懲辦的一種障礙。聯邦調查局處理

这类問題的方式是，把調查結果移交国务院，由国务院宣布該有关外交人員为不受欢迎的人。

有时候，联邦調查局能够根据本身的需要使当局制定出法律。1934年，国会授权联邦調查局在取得一位法官的逮捕状或书面批准的条件下逮捕人。但該局必須提出引起怀疑的足够理由，以防止无辜的人被任意逮捕。1949年，联邦調查局逮捕朱迪思·柯普朗的时候，他們不知为什么竟沒有取得逮捕状。部分由于这个原因，某高等法院就撤消了对她的判决。就在撤消这项判决的一个月內，国会制定了一項新的法律，規定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中不再需要逮捕状。理由是，与其让間諜逍遙法外，倒不如使目前不合法的警察行为合法化；而这种情况也就成了在安全的名义下損害民主程序的一个事例。

联邦調查局干了許多不体面的事：偷听电话、檢查人們的紙簍和垃圾箱、偷拆信件、从女僕口中探听主人的短处、約請受怀疑者的亲戚朋友对他們进行偵察、利用釣餌、逮捕人而不告以原因、引誘人进行坦白，据悉偶尔还要使用武力。

但是联邦調查局还是想干得体面一些的。在向国会解釋联邦調查局偷听电话的活动时，胡佛說得比誰都冠冕堂皇。他在1960年2月間曾經說：“在全美国及其領地上，联邦調查局只用了七十八根偵听綫，所有这些偵听綫都是为安全調查使用的。……联邦調查局所遵循的政策极其严格，我們还不知道有哪个机构，在利用偵听綫以前，必需取得領導部門首腦的书面批准。在我們利用每一根偵听綫时，司法部长——国家的最高司法官——必須考虑所涉及的事实，然后予以批准。这种規定正是一种适当而公允的防止流弊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我們有限制地使用偵听綫进行无理批評的人，正是那些从事犯罪活动或为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进行辯护的律师。”

总的看来，尽管胡佛抱怨說，他受到“各种技术性問題的束